

塞外的基督信仰（下）

貝文典著
李國仁譯

（編者按：作者因事離港，以致現在才能完成本文的最後部份。該文的第一、二部份見於本刊第四、五期。）

大清帝國末年的傳教活動，在踏入本世紀初年便遇上了義和團之亂（1900），這使到剛發軔的中國教會陣腳大亂。結果，教會的傳教政策便只好着重於重建教會和鞏固四散的基督徒團體。在最初的十年，大部份時間是用在重建教會的工作上。到了二十年代，本地化才成爲教會發展的目標。這種情況，在遼闊的塞外——蒙古也是一樣。

一九二二年，中國第一所較具規模的修院在山西大同落成，它所提供的本地神職訓練比以前的更好，而各男女修會也提供了不少修會聖召的培育。此外，許多堂區都顯得協力同心，成人培育和教友訓練，尤其是公教學校和其他教育計劃都受到重視。

事實上，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外籍教士遭受囚禁的期間）塞外的蒙古教會充份表現了自治的精神。

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

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成了許多著作和研究的題材。這次動亂是強烈排外情緒的導火綫，它有如夏日的風暴，襲擊了不少地方。外國傳教士及其帶領的中國教友遂成

爲了主要的攻擊對象。

國人仇視基督教會畢竟是一回複雜的事。多年來，敵視的情緒一直高漲；當這份抑壓多時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時，雙方都有許多人無辜地被犧牲了。許多傳教士固然都是熱心人士，他們都願意造福中國人民。正如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塞外的傳教士都懷着一份理想，希望把福音傳到世界的每一角落。他們不但要使人民得到靈性的益處，也用了很多方法去改善中國貧苦人家（包括皈依者在內）的生活，這些方法包括醫療救援、開辦學校和社會工作等。但是，傳教士也有人性的弱點，易於對皈依者偏袒，這便造成了教外人的反感。

對昔日傳教士所提出的問題，今天也可用來問問我們自己。究竟當日他們對中國的傳統、風俗和習慣熟知多少？他們對中國文化曾有過多少的尊重？即使他們能認同和尊重一切中國人的價值觀，但是他們能否以開放的態度看出上主的救恩臨在於這些價值觀中？顯然，基督教世界與非基督教世界的隔閡非常大，西方傳教士很自然地帶着當日西方的宗教眼光面對中國人的價值系統。由於

這一套價值觀已深深地滲透中國人的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結果，這些傳教士與中國文化有一段距離，格格不入；因此，引起中國社會的激烈反對是可想而知的。

很不幸當日大清皇朝的基督宗教亦被另一因素所遮蔽：外國政府不理會很多教會人士的明顯反對，兵臨中國，要用武力支持傳教修會。

或許是由於官方從中慫恿，又或者並非如此。無論如何，衝突果真來到，並造成了一片混亂恐慌。在塞外，至少有數百名教友和教士捐軀，其中包括了韓默理主教 (Msgr Ferdinand Hamer) 和十一位神父。許多鄉村遭受襲擊，傳教站被毀壞，信友四處疏散。這挫折相當大，但在外國軍事勢力的壓迫下，中國終於屈膝賠款，使到各個外籍傳教組織得到賠償。而這些賠款變成了教會與老百姓分裂的另一因素。

回顧過去，很難判斷教會之接受賠款是不是明智之舉，但這項行動必有其歷史因素，而社會正義亦要求如此。然而，作為救恩工具的教會應否接受賠款，以致造成中國的屈辱？對於這個問題，至今尚未得到答案。

這些事情發生後，塞外出現了重建教會的傳教政策。教友的數目不斷上升，傳教站倍增，本地神職人員比前多出一倍。修會團體紛紛成立，基督徒的生活亦逐漸加深。當時，很注意訓練男女傳道員，而這些傳道員在各傳教站成了傳播福音的教會的「助手」。

聖母聖心會的神父意識到基督徒教育的價值。正如他們在祖國比利時的經驗，他們花了相當大的精力在建立公教學校上。在繁榮的南壕塹（今日稱為尚義）建立了一座師範學院，這所師範學院也許就是民國初年在

塞外建立的第一所專上學院。它為教會學校訓練了不少優良師資。當時曾經有興建更多教育機構和公教大學的意念，但結果是半途夭折。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一切進展停滯下來。當時，歐洲沒有足夠的人力來支援中國教會。經濟的退縮，使自給自足成為生存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基督信仰仍然穿越一切，蜿蜒下去。

回顧這段時期，我們可以說，福音的訊息在中國的北方遼闊的土地上，為各族的人民帶來了性靈上的解放。即使重點在於屬靈的解放；但對那些經濟上有困難的人士和貧苦大眾，教會嘗試合力為他們建設一個較穩定的生活。所以，當日教會雖未能促使社會結構達致改變，但對改善社會確曾提供了不少貢獻。

教士們接觸了很多剛遷到塞外的中國人。但在一向原本居住在蒙古的人來說，傳福音只在某些地方得到成功。寧夏的城川成了中心，這地方起初寂寂無聞，但經過多年的努力耕耘，終於成為一個擁有一千二百名蒙古教友的團體，並且成為三位蒙古籍司鐸的發源地。

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多年來懸而未決的教區界綫問題被劃分清楚。一九二二年教會將塞外的教區委托給聖母聖心會管理，其他修會則負責甘肅全省和新疆伊犁自治區。聖母聖心會將一切可動用的人力都集中在塞外和剛合併的山西大同牧區的宣教事業上，並在大同建立中國第一所大修院。這修院以宗座監牧團為董事，由前任南甘肅宗座監牧湯神父 (Daems) 直接管轄，又組織了一個新的教授團。修院內有來自各監牧區的修生，

他們所接受的培育，着重於基本的訓練，目的是準備他們日後在塞外的教會盡忠職守。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當時的整個課程，是完全根據羅馬的訓示而設計的。那時是聖教法典的黃金時代，各樣事情的細節都依照羅馬所頒的章則來定斷。六年多的培育着重於對教會聖統制的絕對忠誠。這種教育也是支持着一些近乎無可妥協的觀點和絕對的態度。起碼，這種不能兼容並納的所謂忠誠，遲早會在一些自我意識強烈的文化區域內遭到猛烈的反擊，這是早已料到的。當時，一些較為平衡的國籍和外籍司鐸曾反對這種嚴厲的態度，但結果無效。

在事後指出某種制度的弱點未免有欠公允，也不是筆者的本意。我們無意挑出大同修院來討論，因為當日在教會裡面，同樣的事情也普遍出現，例如強調普世性往往成了強調普世劃一，而對於本地文化、價值體系和特色鮮有提及。

然而，天主的救恩臨於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內。即使有時異於所謂西方基督教的價值觀或甚至帶有相反上述價值觀的表徵，仍能夠從它們中找到天主降生成人、居於人類家庭中的標記。可幸的是，教會自梵二以來，這種靈活變通的開放態度已被接納，基督教義要摒棄任何自負的思想，謙卑地進入各地文化中。

這種新的宗教態度畢竟是一種最近才有的現象。本世紀初的教會似乎仍然瀰漫着強硬及頗為獨斷的態度，這種態度亦表現在神職人員的訓練及大修院的培育上。其影響深入中國各地的教友生活，結果就是無可避免地將教友與非教友劃分。幸好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寬容性格使基督徒不致完全被孤立，而且中國的傳統文化發揮了力量去抵禦一切外

來的侵略。

大同修院的精神和培育，影響到塞外區域的基督徒生活。傳教政策集中於強化基督徒團體的靈修生活，要求嚴格。當日鄉間堂區的主日宗教活動如下：

大清早，教友聚集在傳教站內一起作早禱，繼而是教理講授，然後開始感恩祭。中國人以其傳統的學習方式，背誦教理和經文。雖然當日教會仍然採用拉丁文，但教友們都曉得很多歌詠和禱文，所以，即使有語言的障礙，我們仍然可以說，他們有真正的參與。感恩祭後是長長的謝恩祈禱，之後往往是拜苦路。他們差不多都共同參與下午的神修活動，首先是誦念玫瑰經，然後是一篇長長的道理來闡述一個信仰主題。在平常的主日裡，一般都以朝拜聖體和晚禱來結束。

這是在塞外各傳教站的一般做法，在中國其他各地亦大概如此。它強調個人聖化是基督徒生活的主要本份。

在一個像中國那樣的社會裡，既然團體超越個人，個人的良好行為以團體為依歸，且個人的實踐也是屬於團體的，重點在於一致性，因此，不斷地向個別的教友和小型基督徒團體灌輸聖化意識，便會產生一種對世界和俗世事務的輕藐，換言之，即是產生一種不入世的神修。這種神修不僅不夠完整，而且不指向整個人類大家庭的得救，也無法導引人去從事改變社會的結構。

在二千年長的基督教會史中，人類要經常發掘出天主向我們召喚的新方式，要注意救恩形式的平衡發展，焦點放置在天主子民的全面性解放和救恩上。今天，梵二以後的着重點不單在神學上得到擴闊，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實了新的牧民方針，不但着重整個人在肉身和精神上的需要，也注意社會的結構

的改變。

每個時期的傳教工作重點都不相同，環境亦各異，不能用今日的尺度去衡量，只能為今日及未來的教會提供參考和亮光。故此，我們對在塞外從一八六零至一九四九年所建立的基督徒團體的成就表示尊重和欽佩。昔日的年代實非易過，天災和饑饉、盜賊與軍閥、中日戰爭和後期的內戰，都使生活非常困苦，驚惶與不安隨處可見，對許多人來說，傳播喜訊的教會確是一座導航的燈塔。

一九四三年，中日戰爭達到頂峰，外籍教士被囚禁，情況暗淡。本地教會要自行治理，神父與教友都盡力而為。自三十年代開始，一些傳教站已轉由當地神職人員和教友全權負責，現在剩下的四個監牧區也轉入他們的手中。在這些艱辛的年頭中，基督徒團體不只堅強地生存，而且，即使規模有限，還有擴展的動力。這不但是上主的祝福，也是當日教會的努力成果。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被囚禁的外籍教士希望返回他們昔日的傳教站和工作崗位，並願意跟當時的教會分享。幾經艱難，大部份教士都能抵達目的地，可是當時內戰已烈，第八路紅軍橫掃塞外草原，並向中國東北推進。年青的軍人深信解放的訊息，要將之帶給同胞，但不能容忍任何障礙。既然基督宗教一向與西方世界有密切關係，而西方只被認為是侵略中國的勢力，因此，他們便認為基督宗教是一個解放的障礙。此外，「交談」的意願尚未出現，基督宗教與馬克思思想的衝突十分激烈，那句「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句子更使兩方勢不兩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幾年當中，外籍教士確實被逐出境。流亡的人士嘗過許多苦痛與災難，而教徒更受了不少痛苦。

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似乎自鴉片戰爭以來所開創的傳教事業已歸於沉寂。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信仰本身就如芥子，當時的塞外差不多有二十五萬教友和二百五十位神父。若將這個數字放在中國天主教的全景中來看，可以說是頗有成就。不過，統計數字只能代表事實的一部份，信仰的實質才是最重要。雖然，今天的教會在邁向本地化的旅途中尚脫不了西化，但我們可以發現，充滿希望的信仰仍長存不替。